

GUSHIWEN YAOJI XULU

以文献学方法考述 120 种古代文学基本典籍
梳理诗文集的成书、刊刻和流传
考察文献的内容缺失和真伪
讨论选本、注本的优劣
引导原典文本的深度阅读

古诗文要籍叙录

◎金开诚 葛兆光 著

中华书局



古诗文要籍叙录

◎金开诚 葛兆光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诗文要籍叙录/金开诚,葛兆光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5

ISBN 7-101-04770-X

I. 古… II. ①金… ②葛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著作研究—中国 ②古典散文—著作研究—中国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5600 号

书 名 古诗文要籍叙录

著 者 金开诚 葛兆光

责任编辑 樊玉兰

封面设计 刘 丽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 787×960 毫米

印张 37½

印 数 1—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4770-X / 1·645

定 价 68.00 元

再版序言



葛兆光

这部《古诗文要籍叙录》原名《历代诗文要籍详解》，是当年我和金开诚先生合作的旧著，1988年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现在十七八年过去，很多朋友说，这部书已经很难找了。因此，中华书局要重印，重印前，让我写一篇再版序言。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，回想起当年查找版本、考索文献、写作叙录的种种辛苦，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

写这部书是在二十多年前。那时，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，从本科到研究生。现在想起来，古典文献仿佛是一个枯燥的专业，不过，对于一个耽误十年才有机会读书的人来说，这个机会却是很珍贵的。每天在故纸堆里，没有觉得丝毫的辛劳，相反，倒是从已经如烟的往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历史隐情，于是乐此不疲。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好，我们学生的十个普通借书卡，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，即使是到善本部去看书，虽然不能随便借回去，但不管孤本还是抄本，大体上倒也都能让人亲手翻阅。现在恐怕再也没有这样便利的图书条件了。所以，如果让我现在来写这部关于文学古典的书，尽管二十多年后的知识和阅历已经见长，但精力却远不如昔；即使精力依旧，恐怕也不太可能了，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图书条件。记得那时，我每次从图书馆借了几函古书回到宿舍，便在日光灯下，拿了尺子比着，一行一行地读，隔了几天，把这

些看完的书还回去，再借若干，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。

当时，金开诚先生在古典文献专业给本科大学生开一门课，名叫“古代文学要籍介绍”，主要是讲文学古籍的一般情况，因为一直没有教材，所以总想编一本给学生参考。我是他指导的研究生，这一设想由他提出，但具体撰写的事情便落在我的头上。原本，金开诚先生有一个简略的讲义，并不很繁琐和复杂，选的书目也不算多，他只是想让我在讲义基础上稍加添补增删。可是，那时我多少有一些心高气傲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觉得与其修修补补，不如彻底重做，于是便拟定了一个书目，一一在图书馆按图索骥，从古典成书的经过，到版本的流传系统，从注释体例的好坏，到注释是否准确，从收录是否遗缺，到内容是否有伪，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。

大约有两年的时间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我穿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、柏林寺的北图分馆之间，也曾经到过北师大图书馆、人大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。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近乎刻板的工作流程，先是翻检图书馆的卡片柜确定现存诸本，查阅大批藏书目录确定曾经流传的版本，借阅最典型和最容易到手的版本来对比，最后抽取若干卷的文字、注释，与可以对勘的各种资料来考察，这些繁琐的工作占去了大半时间。不知为什么，现在记忆中留下的断片，除了夏热冬寒，挤车艰难之外，总有柏林寺图书卡片柜里让人打喷嚏的灰尘，有在北京图书馆对面朝鲜冷面馆门口蹲着吃面的情景，有在黄得发脆的旧书中发现资料的喜悦。

二

这部书选择和叙述的，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百二十种最重要的诗词和散文的总集（包括选集）、别集和诗文评著作（本来还想把小说、戏曲也一并讨论，后来摊子铺得太大，越写到后来越力不从心，才只好作罢）。那个时候，我自己定的体例，第一是梳理这些文献的成书、刊刻、流传，第二是考察这些总集、别集和诗文评的内容缺佚和真伪，第三是讨论它的选本和注本优劣。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，不免要在古书堆里花大量时间反复翻检对比。

日复一日地查对、比照、阅读，总是有一些发现，也有一些心得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心得被写在了这部书里。举几方面的例子：

在关于文学古籍的成书方面。如对《全唐文》所据底本的考证，我从清代人的文集和笔记中，证明清代官修《全唐文》，是因为用了陈邦彦的旧本《唐文》，才能如此速成，这一结论好像至今还被学界引用；又如在对比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诗纪事》以及各种笔记中宋人所引所传《河岳英灵集》佚文中，发现今本《河岳英灵集》应当是殷璠天宝十二载的二次重编本，因此评论、选录、小传，都与天宝四载初编本已经有差异，反映了天宝四载以后的八年间，殷璠以及当时人对诗歌和诗人评价的变化。可是现在人讨论殷璠，却多据后来的传本，这一点却至今还没有人特别注意；再如考证杜牧最成问题的《续别集》，我曾经引用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序》和《文苑英华》彭叔夏、周必大校勘记及清代《居易录》，指出今天的杜集之所以混入相当多的许浑诗，可能问题就出在宋代所刻的这个《续别集》上，而这个《续别集》由于被收入《全唐诗》，所以才造成了很多麻烦。

在对古籍的对比校勘方面。比如，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《韦苏州集》，我在书中曾经指出它虽然屡经补辑，但诸本仍误收了他人的几首诗，但又漏收了《文苑英华》所载的《春雪》、《龙潭》、《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》等三首；又如，我曾以《中州集》、《元文类》与金元两代各种文集的对校，指出原来以为颇全颇精的《溢水集》、《清容居士集》、《揭文安公全集》、《道园学古录》中，其实有不少文字之误和收录缺遗，这反而证明这两个总集和选集的版本价值。记得当时在撰写各种宋金元别集时，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，把一些总集选集以及《永乐大典》、各种笔记、各种类书大体翻检过，所以，常常在讨论传世各种别集时一一对比。因而，很多现存别集缺收的遗文逸诗，像范成大《石湖集》、赵秉文《溢水集》、赵孟頫《松雪斋文集》、刘因《静修集》、萨都刺《雁门集》等等，我都可以有所举证，这也许对研究这些文学家的人有所助益。

在关于注释的讨论方面。我曾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旧注，也仔细地抽查了一些古人的注释，发现古注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一是穿凿附会地解释背景，像我在书中指出蒋师爚注释阮籍诗时对历史的穿凿附会，冯浩对李商隐

感兴咏怀诗中牛、李党争背景的刻意求索，姚文燮注李贺诗对政治影射的迂曲说解；二是不管具体语境，一律照字面相似引证，因而不能准确解释字义，像书中说到的蒋清翊注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渔舟唱晚”四句，姚文燮注李贺《塞下曲》之“席羈”，方世举注韩愈《山石》诗之“葶确”，陈元龙注周邦彦《琐窗寒》之“剪烛西窗”等等。这些都是用了很仔细的排纂对照的功夫一一发掘出来的例证，也许对于古注的理解会有好处。不过，也许是当年好胜逞强的缘故罢，对于各种注本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批评，像对著名的赵殿成注王维诗《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》中的“七圣”之误、王琦注李白诗《思边》中的“西山”之误，王嗣奭注杜甫《绝句》中的“西岭”之误等等，多少都要进行一些批评，直到几年以后我自己选注唐诗的时候，爬梳检寻，反复推敲，才知道注释之难，因而也对当年过度苛刻的评价标准有了一些反省和检讨。

可当时总觉得不能人云亦云，总觉得要说一些自家的东西，所以很努力地阅读和发掘。于是，虽然书中也参考也依傍了大量前人的研究，但毕竟也有不少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发现。比如关于宋代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作者胡仔的生平，就是我自己从各种地方志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，关于清人萨龙光对于萨都刺生平的编年，就是我自己钩辑资料来驳正的。这种发现的惊讶常常有，在对每一种书的细心阅读中，常常会让我产生莫名的错愕，因为有些听上去名气很大的著作，却常常会有常识上的毛病，一些平常不会产生疑问的地方，却在仔细地对比中被看出了错误，而稍稍深入追问，却能发现很多蹊跷。再随便举几个例子，像《全金元词》收录、校勘和小传的疏漏，像新影印本《宋诗别裁集》作者介绍的张冠李戴等等，真的让人觉得奇怪。至于在阅读比对中发现古人注释的错误，古籍中的误收和漏收，编纂体例的混乱，更是不胜枚举。这倒让我更加理解，为什么胡适说做学问要“在不疑处有疑”。

三

尽管很久以来，我的兴趣转向了禅宗史、道教史和思想史研究，没有再做这样的文献研究，不过，在读研究生期间，这一次和金开诚先生合作进行古代诗文

典籍的考察和研究，却成了我后来做学问很重要的基础之一（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读前四史，做中国史学史）。曾有老一辈学者告诉我说，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，只要一出手，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，是来自经学的训练，还是来自二十四史，是打了《说文》的基础，还是读透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这就像学写字的人，是打小临的颜真卿，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，瞒是瞒不住的。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，但我自己是知道的。我后来做《唐诗选注》也好，做《中国思想史》也好，就得益于这种阅读大量文集的经验，至今，当年为查找资料而收集的北大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藏各种目录及其索书号，当年在图书馆里翻书抄录的卡片资料，还时时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常见的文献，它就好像是潜藏在记忆体里的资源，在激活的时候可以重新浮出水面。

年纪大了，回想起来，发现学古典文献专业还真有它的意义。据说，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特意设置、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，现在已经面临危机。也许学生觉得那些故纸堆很枯燥乏味，爬梳半天也未必有一点发现，缺乏激情更没有吸引力，远不如电视电影来得“爽”，甚至也比不过诗歌小说能够宣泄和轰动。确实，就连当年我在这个专业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被临近专业的同学善意地称为“出土文物”，也确实不及他们容易显露天才与展示抱负，一首诗歌就能传遍校园，一篇小说就让人红了半个中国。不过，学问的事情却不能用刺激和感性的方式评价，“爽”的不一定有用，愉悦和知识是两回事。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不仅有知识，而且还有魅力。就说那时上课的阵容吧，用现在的话说是明星云集，周祖谟先生讲音韵，读到老杜“几回轻泻愁仍破，万颗匀圆讶许同”时仰面呵呵一笑的情景，至今仍然清晰；阴法鲁先生讲《诗经》，稍稍弯腰、微带口音亲切地讲述，让人想起孔子杏坛讲学；裘锡圭先生那时还是中青年教授，他讲文字学，最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是他的不苟言笑。最是一门叫做“古代文化史常识”的课，至今想来，那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豪华队伍，邓广铭、史树青、侯仁之、刘乃和之外，当然还有本系德高望重的王力。

学知识仿佛牛吃草，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，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，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，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“辨章学术，

考镜源流”之门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；当年总觉得学校勤学，真是繁琐恒订，要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，才知道这种比西方“细读”还“细读”的方法，实在是从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；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，也是到了阅历较多，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，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。学问的事情，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，倒像是马拉松，要到了后半程，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。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，理解它常常需要时间。直到如今，我自己当了很久的教师，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，常常劝说学生不要先学天马行空似的宏观研究，而让学生去做那些苦功夫和笨功夫。也许有的学生并不很情愿，但我也很苦恼，因为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原因，因为那只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。

四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中华书局让我来重新校订此书，有朋友询问，是否可以作一些修订，我觉得很为难。

的确，这里面有的知识已经过时，因为二十多年来对于文学古籍已经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。比如，《萨都刺集》的版本和内容，当时也许还算考察比较仔细的，但在这部书出版后一两年，我就与张旭光先生合作重新写了一篇《萨都刺集版本考》，修订了这部书中的结论，而近年来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的一个学生，又以他的博士论文，再度修订了我们的结论。这种后出转精的例子太多。可是，现在金开诚先生没有精力来订补，我也没有时间来更正，只好一仍其旧；也有的典籍已经出版了新本*，而我们二十年前列举和评论的版本可能早已不再重要，像丁福保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，现在早已由逯钦立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所取代，吴之振编的《宋诗钞》，也已经远不如新编《全宋诗》，苏天爵《元

* 编者按：为方便读者查检阅读，我们对近年出版的新整理本，以附注的形式作了提示，仅供参考。

文类》更是被新编六十册《全元文》所替代，《全唐诗》及其补辑，也早有了陈尚君的《补编》，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。二十年间，中国的学术变化太多太快，我觉得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追踪、来更新。好在就这样保存当年的原状，虽然留存了一些当年的疏漏和讹误，但是，它既可以让人看到二十多年前人们依据文献的实况，也可以保留一份学术史资料。因此，在这次重印时，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文字修订，删去了一些文学史常识叙述，至于有关文献的部分则一仍其旧。

常常和朋友谈起，如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让人满意。原来从基本文献中爬梳资料重建古代文学历程的基本传统，好像现在不那么受人敬畏了，本来是入门的文学史教科书加上以嚼饭喂人的文学作品选，却好像成了现成的框架被人们方便地套用。特别是，三两个被翻译的舶来洋词，好像在很堂皇地指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路，而貌似新潮的那些汉学家的绕路说禅，原本只是避免古文献释读困难的借口，却仿佛成了金科玉律。最近，我看了一些硕士甚至博士论文，始终搞不明白，既然有这么丰富而生动的古代中国文学世界，为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却如此狭窄而陈旧，好像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似的，所有的翻新出奇，似乎都靠着“乘坐概念和名词的纸飞机”，在想象的空中一边翻滚一边俯瞰，觉得这真是一片“未开垦的处女地”。于是，更感到这种悬浮在古典文献之上，仅仅凭着教科书和作品选作为指南来寻找课题的风气，实在让人感到悲哀。于是我想，在这样的时候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，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，因此，在这部书再版之际，我写下这些话，作为这部可能读来很枯燥的旧书的再版序言。

2005年6月25日于蓝旗营寓所

目 录



再版序言(葛兆光)	/1
诗 经	/1
楚 辞	/13
玉台新咏	/29
乐府诗集	/34
古诗源	/39
古谣谚	/43
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	/46
唐人选唐诗(十种)	/51
全唐诗	/64
唐诗三百首	/69
宋诗钞	/73
中州集	/78
元诗选	/82
明诗综	/87
晚晴簃诗汇	/92
五朝诗别裁集	/96
敦煌曲子词集	/104

花间集	/107
尊前集	/110
花庵词选	/113
绝妙好词	/117
词 综	/122
词 选	/126
全宋词	/129
全金元词	/135
全清词钞	/139
文 选	/143
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	/151
文苑英华	/156
唐文粹	/161
全唐文	/165
宋文鉴	/169
南宋文范	/172
金文最	/176
元文类	/179
明文衡	/183
清文汇	/187
古文观止	/191
古文辞类纂	/196
骈体文钞	/201
曹操集	/205
曹植集	/208
阮籍集	/212
嵇康集	/217
陶渊明集	/222

谢灵运集	/230
鲍照集	/233
谢朓集	/238
江淹集	/241
庾信集	/244
王勃集	/250
陈子昂集	/254
孟浩然集	/257
王维集	/261
李白集	/270
高适集	/281
岑参集	/284
杜甫集	/288
韦应物集	/303
韩愈集	/306
柳宗元集	/314
刘禹锡集	/320
李贺集	/323
白居易集	/331
杜牧集	/337
李商隐集	/343
温庭筠集	/351
李璟李煜集	/355
王禹偁集	/358
梅尧臣集	/362
欧阳修集	/366
苏舜钦集	/372
王安石集	/375

苏轼集	/382
黄庭坚集	/393
秦观集	/402
周邦彦集	/405
李清照集	/410
陆游集	/414
范成大集	/419
杨万里集	/423
辛弃疾集	/428
姜夔集	/432
元好问集	/436
刘因集	/441
赵孟頫集	/444
揭傒斯集	/447
萨都刺集	/450
杨维禎集	/455
宋濂集	/460
刘基集	/464
高启集	/467
李攀龙集	/471
王世贞集	/473
归有光集	/476
袁宏道集	/479
钱谦益集	/483
吴伟业集	/488
朱彝尊集	/494
王士禎集	/500
纳兰性德集	/505

方苞集	/507
袁枚集	/510
姚鼐集	/514
龚自珍集	/516
文心雕龙	/521
诗 品	/529
二十四诗品	/533
诗话总龟	/538
苕溪渔隐丛话	/541
唐诗纪事	/544
诗人玉屑	/548
沧浪诗话	/551
词 源	/554
唐音癸签	/557
带经堂诗话	/561
宋诗纪事	/565
随园诗话	/570
白雨斋词话	/573
人间词话	/576
后 记	/579

诗 经



《诗经》本来叫《诗》，又叫《诗三百篇》，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。其中包括三百零五篇诗；另有六篇有目无辞，叫做“笙诗”。有人说“笙诗”只是笙乐的名目，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，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。也有人说“笙诗”是用笙伴奏的诗，本来是有辞的，后来失传了。究竟哪一种说法对，现在也不能确考。总之，《诗经》中实际存在着三百一十一个题目，三百零五篇诗。

《诗经》中的诗是按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大部分编排起来的。其中《风》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等十五国风，共计一百六十篇。《雅》分为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，《小雅》实际是七十四篇，外加六个“笙诗”题目；《大雅》则有三十一篇。《颂》分为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，《周颂》有三十一篇，《鲁颂》有四篇，《商颂》有五篇。“诗三百篇”本来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，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也就因乐调分类而得名：所谓“风”，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调，“十五国风”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。“雅”也写作“夏”，是正的意思，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调，在周人看来这是“正声雅乐”（有别于各地的土风），而用这种乐调演唱的诗歌就归入“雅”的部分。“颂”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，收入这一部分的诗歌当然也用于祭祀；至于祭祀用的舞曲为什么叫做“颂”，则有不同的解释，解释之一是“颂”通“镛”，“镛”是大钟，这种舞曲因为用大钟伴奏所以叫“颂”；另一种解释是“颂”有形容的意思，这种舞曲因为用来形容赞美祖宗的功德，所以叫“颂”。这些解释都可供参考。

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就其创作时间而言，早至西周初期，晚到春秋中叶（公元前

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);就其产生的地域而言,涉及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北各省;再就其作者而言,则又有各种身份的人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:来源如此复杂的诗,究竟是怎样編集在一起的?关于这个问题,过去有所谓“王官采诗”和“孔子删诗”两种传说,前者就是对大量诗歌最初被采集的解释,后者就是对这些诗歌删编成书的解释。所谓“采诗”,据汉代人说,这是由上古时代传下的一种制度,到周代还保存着。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民歌民谣,以便了解民情,察看政治的得失。由于长期坚持采集,所以就积累了大批的诗歌。关于“删诗”的说法,最早见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:“古者诗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。……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。”这就是说,目前这部三百零五篇的《诗经》乃是个选本,编选人是孔子;他有个选择的标准,是只取那些“可施于礼义”的作品。

那么“王官采诗”、“孔子删诗”究竟可信不可信呢?关于“孔子删诗”,唐代以下就有人提出疑问,后来怀疑的理由越来越多,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孔子只对诗三百篇做过一番正乐的工作,就是说各部分诗歌的乐调在长期流传中已经发生混乱,孔子使它们在音乐上尽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;然而他却并没有对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进行什么删编,他当时所见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编排上都和现在所见的差不多。总之,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“孔子删诗”基本上不可信。至于“王官采诗”的问题却不那么简单,长期以来不少人对“采诗”表示怀疑,也提出了种种有力的理由,但是他们一般都破而不立,即否定了“王官采诗”之后没有提供较为可信的解释,来说明在那么长的时间中、那么大的地区中产生的诗歌是怎么集中和编排起来的。这个问题大概还要作为文学史上的一宗疑案长期存在下去。不过也有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,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的乐官、乐工们在诗歌的收集和编订中是起了较大作用的。因为他们要在各种典礼仪式中奏乐唱诗,还担负着把诗传授给贵族子弟的任务,所以很可能要做诗歌的收集、保存、加工、编排等工作。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,诗歌逐渐不用于各种典礼仪式,也逐渐与音乐分家,《诗三百篇》便主要作为一部诗集流传于世。关于《诗三百篇》的成书过程,现在也只有这点未必确切的了解。

在《诗三百篇》的传承中,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是因为孔子本人很重视